

# 社会改良还是 社会革命？

罗莎·卢森堡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 社会改良还是 社会革命？

罗莎·卢森堡著  
徐 坚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

Vulkan Verlag Leipzig, 1919.

根据莱比锡火山出版社1919年版译出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德〕罗莎·卢森堡著

徐 坚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5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3\frac{3}{4}$  · 字数 81,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定价(9) 0.50元

统一书号 3002·52

校对者：崔小南等

## 出版者說明

罗莎·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一著作，是维护馬克思主义反对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革命文献。

罗莎·卢森堡在这本著作中用鮮明的事实、严谨而鋒利的論証，深刻地批判了当时的修正主义論点，揭露了修正主义的反动实質。不过，她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并非彻底馬克思主义的，比如在同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的問題上，她就不了解不仅必須从思想上而且必須从組織上同他們划清界限。所以，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同孟什維克关于党内組織原則問題展开斗争时，她就曾站到孟什維克那一方面。然而，罗莎·卢森堡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正如列宁說的：“鷹有时比鷄还飞得低，但鷄永远不能飞得象鷹那样高。……虽然犯了这些錯誤，但她始終是一只山鷹。”

今天，当我们正向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温习一下罗莎·卢森堡当年为反对伯恩斯坦主义而写的这本著作，是会大有教益的。因此，我們决定将这本著作翻譯出版。

## 目 次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1
第一部分	
一 机会主义的方法 .....	2
二 资本主义的适应 .....	7
三 通过社会改良实行社会主义 .....	15
四 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 .....	22
五 修正主义的实际结论和一般性质 .....	27
第二部分	
一 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 .....	35
二 工会、合作社和政治民主 .....	43
三 夺取政权 .....	52
四 崩溃 .....	61
五 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际 .....	65
民军和军国主义.....	71
站在工人背后的“德意志科学” .....	88

# 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 第一部分<sup>①</sup>

本文的标题，初看会叫人感到惊奇。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那么，社会民主党可以反对社会改良么？或者说，它可以把成为它的最終目的的社会革命，把推翻現存制度，同社会改良对立起来么？当然不是。社会民主党认为，为了社会改良、为了在仍然是現存制度的基础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了各种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日常的实际斗争，宁可说是引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求达到最終目的、达到掌握政权和废除雇佣制度的必經之路。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間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

我們在爱德华·伯恩斯坦的理論中第一次看到把工人运动的这两个要素对立起来。在他发表在1897—1898年“新时代”报上的、题目叫作“社会主义問題”的一批論文中，特别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这一著作中，他表述了这种理論。这整个理論，总结起来实际上不是别的，只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終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

<sup>①</sup> 这是对于伯恩斯坦发表在1897—1898年“新时代”上的一批論文“社会主义問題”的評論。那些論文在1898年由萊比錫“人民报”印成单行本。

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伯恩斯坦自己曾最中肯地、最精确地表述了他的见解，他是这样写的：“在我看来，最终目的算不得什么，运动就是一切。”

但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个唯一的决定性的要素，它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急进主义区别开来，它把整个工人运动从适足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无谓的装饰品变成反对这个制度的、为废除这个制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因为如此，“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个问题，在伯恩斯坦的意义上，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同时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同伯恩斯坦及其门徒论辩的问题，最终说来，不是这种斗争方式还是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策略还是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

认识这一点，对于工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在运动中影响的问题，因为这里正是拿他们的生命去冒险。伯恩斯坦从理论上表述了的党内机会主义思潮，不是别的，正是让那些靠攏党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居于上风、依他们的精神来改造党的实际工作和党的目的的一种盲目的企图。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问题，最终目的和运动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就是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

## 一 机会主义的方法

如果说，理论是外在世界的现象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那么，在伯恩斯坦理论的面前，就无论如何得加上一句，——往往是颠倒了反映。伯恩斯坦的理论，是在德国的社会改良已经

长眠之后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論，是在英国机器工人失败之后主张由工会监督生产过程的理論，是在薩克逊已經修改了宪法、国会普选权已經被扼杀之后主张社会民主党在議會中爭取多数的理論！可是，伯恩斯坦論述的重点，我們看来，不是他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的見解，而是他关于資本主义社会客观发展过程所說的話，那些見解同这些話当然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照伯恩斯坦的看法，一方面，由于資本主义制度越来越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越来越分化，資本主义由于本身的发展而发生崩潰的事，看来越来越不可能了。資本主义的适应性，照伯恩斯坦的看法，表现在三方面：第一，由于信用制度、企业主組織和交通通訊工作的发展，普遍性危机消失了，第二，由于生产部門不断分化，也由于无产階級中有一大批人提高到中間阶层的地位，中間阶层表现出頑强性，最后，第三，由于工会斗争的結果，无产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了。

从此得出的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斗争的总的指示是：它的策略，不是去掌握国家政治权力，而是去提高工人階級的地位，不是通过一个社会政治危机去实行社会主义，而是通过逐步扩大社会控制、逐步贯彻合作原則去实行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自己看不到他的議論中有什么新的东西，他倒以为这些議論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些說法，同社会民主党一貫采取的总方針，意思是一样的。可是，在我們看来，很难否認，伯恩斯坦的見解实际上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途径有着根本的矛盾。

如果伯恩斯坦的全部修正总起来說是認为資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比人們平常設想的要慢的多，那么，这种看法在实际上只是



意味着把一贯主张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推迟一些，从此得出的结果，实际上顶多是斗争的速度放慢而已。但是，事情不是这样。伯恩斯坦作为问题提出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本身，以及同这个发展过程有关的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

直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理论总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我们以为，我们在这里必须分别两个方面：其一，是这里所包含的根本思想，其二，这些思想的表面形式。这里的根本思想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由于自己、由于本身的矛盾使时机成熟，那时它将崩溃，它将干脆成为不可能存在。人们把这个时机想成是一个普遍的、震动一切的商业危机的形式，是一定有他的道理的，但是，虽然如此，对那个根本思想来说，这个形式总还是非本质的、附带的东西。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大家知道是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后果为依据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着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第二是生产过程的迈着大步走向社会化，这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确实的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阶级觉悟，这是就要来到的变革的积极因素。

伯恩斯坦所拔掉的，是上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中的第一个。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一个普遍的经济危机。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崩溃的一定形式，并且也否定了资本主义崩溃本身。他明确地说过：“或许有人答复说，当人们说到现社会的崩溃时，心目中多半有一个比过去更加剧烈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由于本身矛盾引起的总崩溃”，关于这一点他答复说：“由于社会的前进的发展，现在的生产制度看来不是更有可能而是更不可能发生一个几乎同时

的全面的崩潰，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适应性；另一方面，——或者說，与之同时——工业分化的过程加强了。”<sup>①</sup>

如果是这样，倒出了一个大大問題了：究竟我們为什么还能够达到和怎样才能达到我們的奋斗目标呢？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現出来的，也是无政府状态把这个制度赶进了一条死胡同。如果同伯恩斯坦一样，認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自己的崩潰，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客观上必然的事情了。于是，从社会主义的科学依据的基石中，只剩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另外两个后果，就是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这一点，伯恩斯坦也看到了的，他說：“社会主义的思想界（在废除了崩潰論后）毫不丧失信心。因为，仔細看来，我們前面指出过的废除或改变从前的危机的一切因素究竟是什么呢？它們同时也就是使生产和交換社会化的前提，一部分甚至还是它的出发点的一切东西。”<sup>②</sup>

只要稍为考虑一下，就可以証明这也是个錯誤的結論。伯恩斯坦把卡特尔、信貸、完善的交通工具、工人阶级的提高等等現象当作资本主义的适应工具，这些現象的意义何在呢？显然是在于这些現象废除了或者至少緩和了资本主义經濟内部的矛盾，防止了这些矛盾的展开和激化，由此可見，废除危机，就是指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废除生产和交換之間的矛盾，而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一部分作为工人阶级来提高，一部分升到中間阶层，——就是指資本和劳动之間的矛盾的緩和。可是，既然卡特尔、信貸、工会之类废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使资本主义免

① “新时代”，1897—1898年，第18期，第555頁。

② 同上，第554頁。

于崩溃，把资本主义保存了下来，——因此伯恩斯坦才把它们称作“适应工具”，——那么，它们对于社会主义又怎么会同时表现为“前提，一部分甚至还是出发点”呢？显然，这是就它们更强烈地表现出生产的社会性这一点上说的。但是，既然它们使生产的社会性保持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那么反过来说，它们也就使社会化了的生产无须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过渡就成了多余的事了。因此，这些现象的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和前提，就只是就概念上说是如此，而不是就历史上说是如此了，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我们知道这些现象是同社会主义有连带关系的，但是事实上它们不但不会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反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多余的事了。这么一来，社会主义的依据，就只剩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觉悟也不是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矛盾和行将到来的崩溃在精神上的简单反映，——因为崩溃已经由适应工具防止了，——而只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信服力量是以它自己的想象社会主义的完美性为依据的。

总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得到的，是社会主义纲领的一个出于“纯知”的根据，即唯心的根据，而客观必然性、即出于物质的社会发展进程的根据，却消失了。修正主义理论面对着一个选择：“非此、即彼”。或者，社会主义改造在将来也还是同过去一样，是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那么，这个制度发展了，它的矛盾也就发展了，在某种形式上，在某一时候，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那么，“适应工具”也是无能为力的，而崩溃论是正确的。或者，“适应工具”真正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使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因而它的矛盾能够废止，如果是那样，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它

就成为人們願意它怎样它就怎样的东西，唯独不是社会物質发展的一个結果。这个两刀論法，总起来說也是另一个：或者，修正主义对資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想法是对的，那么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个烏托邦，或者，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烏托邦，那么“适应工具”論就必然站不住。問題就在这里。

## 二 資本主义的适应

照伯恩斯坦的看法，使資本主义經濟能够适应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信用、改良了的交通工具和企业主的联合組織。

从信用說起吧，信用在資本主义經濟中有多方面的职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家知道，增加生产的扩张能力并媒介和便利交換的进行。在資本主义生产要求超越私有制的界限而无限扩张的內在倾向同私人資本的有限規模发生冲突的地方，信用就插进来，作为用資本主义方式解决这个限制的手段，把許多个私人資本溶合成为一个資本——股份公司——，并讓一个資本家能够去支配別人的資本，——工业信用。另一方面，当作商业信用，它加速了商品交換，因而使資本更快地回到生产，加速了生产过程的整个循环。信用的这两个最主要的职能，对于危机的形成有什么影响，是容易看得出的，既然，如大家知道的那样，危机是从生产的扩张能力、扩张趋势同有限的消費能力之間的矛盾产生的，那么，照上面所說的情况，信用恰恰是使得这种矛盾尽可能經常爆发的特殊手段。首先，信用把生产的扩张能力提高到极大，造成促使生产不断超越市場界限的內在动力。而它又是从两方面着手的。如果它一度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召来了生产过剩，那么，在危机过程中，它又以商品交換的媒介的資器

把自己所喚起的生产力打击的更加彻底。銷路滞塞的现象刚刚露出苗头，信用就紧縮了，它在成为必需的地方遺弃了交換，而在它还提供的地方，則証明自己沒有作用也沒有目的，因而在危机过程中，把消費能力縮減到最低限度。

信用对于危机的形成，除了上述两个重要后果以外，还有許多影响。信用不但向一个資本家提供了支配別人資本的技术手段，并且同时是推动一个資本家肆无忌憚地用別人資本进行大胆投机的刺激。它不仅作为商品交換的不講信义的手段使危机尖锐化，并且也使危机容易发生和扩大，因为信用把交換变成了一个十分集中和精致的机构，只用最低限度的金屬貨幣作现实的基础，因而很小的刺激就会引起混乱。

由此可見，信用虽不是排除危机的手段，也不是那怕減輕危机的手段，恰恰相反，它对于危机的形成倒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因素。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信用的特殊职能——最一般地說——不外是从一切資本主义关系中清除等級固定性的残余，处处灌输最大可能的弹性，把一切資本主义力量变成高度能够扩张的、相互关联的、敏感的力量。因此，危机——这不过是資本主义經濟中互相对抗力量的周期冲突——只能因信用而易于发生和加深，这是非常明显的事。

这同时把我們引到另一个問題上来了，信用究竟怎样能够表现为資本主义的一个“适应手段”呢？通过信用来达到的“适应”，不論从什么角度和什么內容来設想，它的本質显然只能是平衡資本主义經濟的某种对立关系，消除或者緩和它的某种矛盾，因而在某一点上把束縛住的力量解放出来。可是，在现今資本主义經濟中，如果有一个手段使它的一切矛盾发展到极頂的話，这个手段恰恰就是信用。信用加强了生产方式和交換方式

之間的矛盾，因为它使得生产变成极端紧张，但是使得交換稍为遇到些什么就会瘫痪下来。它加强了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間的矛盾，因为它使生产脱离所有权，因为它使生产中的資本变成一种社会的東西，而利潤的一部分却采取資本利息的形式，因而資本变成了一种單純的財產权。它加强了財產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間的矛盾，因为它通过剥夺許多小資本家的办法把巨大的生产力結合到少数人手中。它加强了生产的社會性和資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之間的矛盾，因为它使得国家参与生产（股份公司）成为必需。

总而言之，信用把資本主义世界的一切主要矛盾复制出来，推动它們达到极端，加速了它走向自己的灭亡（崩潰）的过程。因此，如果說要在信用方面替資本主义找一个适应手段的話，那么，它首先应该是废止信用，撤銷信用。象現在这样的信用，决不是一个适应手段，倒是具有高度革命作用的破坏手段。正是信用的这种革命的、越出資本主义本身的作用，甚至迷惑人們去作社会主义气味的改良方案，使法国的伊薩克·貝勒之流的竭力主张信用的人們，如馬克思說的，表现为一半象先知，一半象废物。

資本主义生产的第二个“适应手段”——企业主的联合組織，在仔細研究之后，証明这也是不堪一击的。依伯恩斯坦的說法，这种組織，通过管理生产的办法，应该使无政府状态告一結束，防止危机。当然，对于卡特尔和托辣斯的发展，还没有从它們的多方面的經濟作用研究过，这个现象，还只是一个問題，只有运用馬克思的学說才能解决。但是无论如何，下述一点还是明白的：只有当卡特尔、托辣斯等变成近乎包罗一切、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形式的时候，才說得上通过企业主联合組織防止資

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但是卡特尔本身的性質就排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企业主联合組織的最終經濟目的和作用，就是在一个部門内部禁止在分配世界市場利潤方面的竞争，以便提高这个工业部門在世界市場上所得到的份額。而这种組織要提高这个工业部門的利潤率，又只有牺牲别的部門才行，因此，它恰恰不能变成普遍性的組織。如果它居然包括了一切重要工业部門，它的作用也就消失了。

企业主联合組織，就在它实际应用的範圍內所起的作用，也是同废除工业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的。卡特尔为了在国内市場达到上述提高利潤率的目的，通常用那部分为滿足国内需要还用不上的閑置資本为国外生产，而所要求的利潤率则低得多，就是說，它的商品在国外銷售时价格比国内低得多。結果，在国外剧烈竞争，在世界市場上出現更大的无政府状态，就是說同願望恰恰相反。在这方面，国际制糖工业卡特尔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

最后，总之企业主联合組織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現象形态，只应该当作資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一定的局面来理解。实在是这样！归根結底，卡特尔本来就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手段，是用来制止个别生产部門中利潤率的致命的下降的。但是卡特尔究竟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根本地说，不过是把一部分积累起来的資本閑置起来，这就是說，用的方法同危机时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但是这样的治疗方法，对于疾病正是半斤和八两，到一定期間为止，比如对于小病，那是有效的，但是再往前去就不行了。当世界市場十分成熟，給竞争着的資本主义各国占完了地盘，——不可否認，这样的时机迟早会来到的，——因而銷售市場开始紧縮的时

候，把一部分資本勉强閑置起来的情况就会增长到这种程度，以致連医生自己也病倒了，由这些組織大大社会化了的資本，就反过来变成私人資本。每个私人的資本部分，就要憑自己的本領用变小了的財產到銷售市場去为自己找一块小小地盘。到那个时候，这些組織必然同肥皂泡一样破灭，再讓位于加强了多少倍的自由竞争<sup>①</sup>。

因而，总的說来，卡特尔正同信用一样，也是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归根結底只有使資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扩大化，使它的內在矛盾暴露出来并趋于成熟。它使生产方式和交換方式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因为它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間的斗争发展到极頂，就象我們特別是在美国见到的那样。它还使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因为它把組織起来的資本的威势以最残酷的形式与劳动界对立起来，因而資本与劳动之間的对立达到了极端。

最后，它使資本主义世界經濟的国际性和資產階級国家的民族性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因为它有普遍展开的关税战争作为随伴的現象，因而各个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对立趋于极端。此

<sup>①</sup> 恩格斯在1894年給“資本論”第三卷写的一个脚注中說：“自从写了以上一段話(1865)以来，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世界市場上的竞争是大大加强了。迅速而大量高涨的現代生产力，日益超过了資本主义商品交換規律的高度，前者原来应该在后者范围之内活动的，这个事实今天迫得連資本家自己也越来越感觉得到了。这一点特別表现在两个征象上：第一、新的普遍的保护关税的热狂，它同过去的保护关税措施不同的地方，特別表现在恰恰是輸出品最受保护。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門的厂主們为了調节生产、价格和利潤而成立的厂主卡特尔(托辣斯)。一看就明白，这些試驗只在經濟气候順利的时候可以实行。第一陣风雨必然把它們抛上垃圾堆去，并且証明，尽管生产是需要調节的，但配担当这个責任的一定不是資產階級。暂时，这些卡特尔只有这个目的，就是大的吞小的，比以往吞的还快。”(參閱“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6頁)



外，卡特尔对于生产集中和技术改进等等还有直接的和非常革命的作用。

这样看来，卡特尔和托辣斯，就它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作用来看，不仅不是什么消除它的矛盾的“适应手段”，恰恰是使它加强无政府状态、使它所包含的矛盾暴露，并加速它的崩溃的手段之一。

可是，如果说信用和卡特尔之类并不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怎么会自从1873年以后二十年之久没有普遍的商业危机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标志，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少在主要方面实际上“适应”着社会的需要，而马克思所作的分析不是过时了吗？

答案紧跟着问题。伯恩斯坦在1898年刚刚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作废物抛掉，1900年就爆发了一个普遍性的剧烈的危机，而在七年之后，在1907年，一个新的危机又从美国出发扩展到世界市场。因此，资本主义“适应”论，早已被响亮的事实打得一败涂地。同时，这证明了，有些人因为看到马克思危机理论两次据说“到期”不灵就放弃了这个理论，他们是把这个理论的核心同这个理论的非本质的表面枝节即十年一个周期，混为一谈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周期定为十年一期，这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这个事实并非依据什么自然规律，它所依据的，是同年青资本主义的作用范围的跳跃式扩展联系着的一系列明确的历史情况。

实际上，1825年的危机，是前十年间大规模投资兴筑道路、开凿运河和设立煤气厂的结果，事情主要是在英国，正如危机本身也是在英国。接着的1836—1839年危机，同样是大量投资兴建新的运输工具的结果。1847年危机，大家知道，是英国建筑铁